

殷周政古

(讲义)

商 周 考 古

(中国考古学之三)

试 用 讲 义
请 提 意 见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一九七二年九月

序 言

商周考古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我国青铜时代——奴隶社会历史的学科。

从原始公社制度崩溃以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

世界上许多地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是伴随着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开始的。而在我国和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印度等地区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奴隶社会的历史在青铜时代已经开始了。

按照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序列，青铜时代到来之前，还有一个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时期——红铜时代，或者叫做铜石并用时代。红铜质软，用红铜制造的器具不如石器坚硬和锋利，因而在生产上起的作用不大。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铜锡合金的青铜，较之红铜有着显著的优点：第一、熔点低。红铜熔点一般是摄氏1083度，若加锡15%，熔点就降低到960度；若加锡25%，熔点就降低到800度。这样的温度，是当时人们容易办得到的。第二、硬度大。红铜的硬度是博林氏（*Brinell*）硬度计的35度，若加锡5—7%，就增高到50—60度；若加锡7—9%，就增高到65—75度；若加锡9—11%，就增高到70—80度。这样就可视不同器类的需要酌情增减，铸成各级硬度不同的器物。第三、溶液膨胀系数大，灌注范内无微不入，铸器容易得出锐利的锋口，且少存气孔。青铜因有这些优点，用青铜铸造的器具就远较石器和红铜器合用，虽然它还不能完全排除石器，但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疑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毛主席在论述我国古代历史时指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①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已经发明铜器，建立国家。对于夏代的历史，我们了解得不多，目前从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那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但是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有丰富的材料证明，至少从商代开始，已经广泛使用了青铜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商、西周、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也是奴隶制占主导生产方式的时期。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之一，奴隶制度代替原始公社制度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奴隶制刚建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内，它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开始，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在评价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时对这种作用曾经有过充分的说明，恩格斯指出：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

洲。”^①

但是，奴隶制度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贵族对平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奴隶制度从其一开始就包含着压制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积极性的一面，这“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社会愈是向前发展，它愈益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正像原始公社制度必然被奴隶制度所代替一样，奴隶制最终也必然在奴隶不断起义的打击下被摧毁，而为封建制所代替。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正是“前徒倒戈”的奴隶推翻了貌似强大的商王朝，正是“国人暴动”、“盗跖起义”等接连不断的奴隶与平民的反抗斗争最终结束了奴隶社会的历史，而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了中国的封建制时代。

作为研究我国商周时期奴隶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商周考古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基本任务，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对考古发掘和调查出来的这一时期的遗迹、遗物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复原我国奴隶社会的历史，具体而生动地阐明我国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又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揭示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揭露奴隶主阶级的残暴，歌颂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

考古学是研究阶级斗争的科学。学习商周考古还必须密切结合现实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陈独秀、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散布的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谬论，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御用文人为适应反华需要而炮制的“中国青铜文化北来说”之类的反动观点。

商周考古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丰富多彩的。诸如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当时人们的居址、房基、窖穴、水井、作坊、沟道、城垣、墓地、葬坑、车马坑等遗迹，以及人们使用的青铜、石、玉、骨、蚌、陶等各种质料的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艺术品等遗物，都是商周考古研究的范围。至于商代甲骨文、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则早已成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了。

根据现有资料，大体可以将我国青铜时代——奴隶社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一、商代早中期（约公元前16世纪以前——公元前14世纪）

是青铜时代开始、奴隶制产生并初步发展的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为典型遗址。

二、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约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9世纪中叶）

青铜时代由发展走向高峰，奴隶制达到盛期。安阳殷墟与西安沣西（早期）为典型遗址。

三、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9世纪中叶——公元前5世纪中叶）

青铜文化趋于衰落，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西安沣西（晚期）、晋、郑、齐、楚等列国都城遗址为典型遗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商周时期的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青铜时代的民族文化：北方和东北有药王庙文化；西北甘、青一带有辛店、寺洼、卡约、沙井文化；南方包括台湾、香港有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等。这些文化与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商周青铜文化有密切联系，并且互相影响，都共同为缔造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78页人民出版社 1970年

② 同上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章 商

第一节 商代早期.....	(3)
第二节 商代中期.....	(8)
第三节 商代晚期.....	(16)

第二章 西周至春秋

第一节 概说.....	(37)
第二节 西周前期.....	(41)
第三节 西周后期至春秋初.....	(64)
第四节 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	(61)

第三章 商周时期边区的青铜文化

第一节 北方地区的药王庙文化.....	(71)
第二节 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	(73)
第三节 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77)

附：参考书目录.....	(80)
--------------	------

序 言

商周考古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我国青铜时代——奴隶社会历史的学科。

从原始公社制度崩溃以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

世界上许多地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是伴随着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开始的。而在我国和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印度等地区特有的历史条件下，奴隶社会的历史在青铜时代已经开始了。

按照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序列，青铜时代到来之前，还有一个由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时期——红铜时代，或者叫做铜石并用时代。红铜质软，用红铜制造的器具不如石器坚硬和锋利，因而在生产上起的作用不大。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铜锡合金的青铜，较之红铜有着显著的优点：第一、熔点低。红铜熔点一般是摄氏1083度，若加锡15%，熔点就降低到960度；若加锡25%，熔点就降低到800度。这样的温度，是当时人们容易办得到的。第二、硬度大。红铜的硬度是博林氏（*Brinell*）硬度计的35度，若加锡5—7%，就增高到50—60度；若加锡7—9%，就增高到65—75度；若加锡9—11%，就增高到70—80度。这样就可视不同器类的需要酌情增减，铸成各级硬度不同的器物。第三、溶液膨胀系数大，灌注范内无微不入，铸器容易得出锐利的锋口，且少存气孔。青铜因有这些优点，用青铜铸造的器具就远较石器和红铜器合用，虽然它还不能完全排除石器，但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疑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毛主席在论述我国古代历史时指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①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已经发明铜器，建立国家。对于夏代的历史，我们了解得不多，目前从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那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但是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有丰富的材料证明，至少从商代开始，已经广泛使用了青铜器，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商、西周、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也是奴隶制占主导生产方式的时期。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之一，奴隶制度代替原始公社制度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奴隶制刚建立之初的一段时期内，它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开始，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在评价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时对这种作用曾经有过充分的说明，恩格斯指出：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86页

洲。”^①

但是，奴隶制度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贵族对平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奴隶制度从其一开始就包含着压制奴隶们创造历史的积极性的一面，这“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社会愈是向前发展，它愈益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正像原始公社制度必然被奴隶制度所代替一样，奴隶制最终也必然在奴隶不断起义的打击下被摧毁，而为封建制所代替。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正是“前徒倒戈”的奴隶推翻了貌似强大的商王朝，正是“国人暴动”、“盗跖起义”等接连不断的奴隶与平民的反抗斗争最终结束了奴隶社会的历史，而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了中国的封建制时代。

作为研究我国商周时期奴隶社会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商周考古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基本任务，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对考古发掘和调查出来的这一时期的遗迹、遗物和古代文献的综合研究，复原我国奴隶社会的历史，具体而生动地阐明我国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又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揭示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状况，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揭露奴隶主阶级的残暴，歌颂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

考古学是研究阶级斗争的科学。学习商周考古还必须密切结合现实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陈独秀、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散布的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谬论，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御用文人为适应反华需要而泡制的“中国青铜文化北来说”之类的反动观点。

商周考古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丰富多彩的。诸如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当时人们的居址、房基、窖穴、水井、作坊、沟道、城垣、墓地、葬坑、车马坑等遗迹，以及人们使用的青铜、石、玉、骨、蚌、陶等各种质料的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艺术品等遗物，都是商周考古研究的范围。至于商代甲骨文、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则早已成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了。

根据现有资料，大体可以将我国青铜时代——奴隶社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一、商代早中期（约公元前16世纪以前——公元前14世纪）

是青铜时代开始、奴隶制产生并初步发展的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为典型遗址。

二、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约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9世纪中叶）

青铜时代由发展走向高峰，奴隶制达到盛期。安阳殷墟与西安沣西（早期）为典型遗址。

三、西周后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9世纪中叶——公元前5世纪中叶）

青铜文化趋于衰落，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奴隶制走向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西安沣西（晚期）、晋、郑、齐、楚等列国都城遗址为典型遗址。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在商周时期的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青铜时代的民族文化：北方和东北有红山文化；西北甘、青一带有辛店、寺洼、卡约、沙井文化；南方包括台湾、香港有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青铜文化等。这些文化与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商周青铜文化有密切联系，并且互相影响，都共同为缔造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178页人民出版社 1970年

② 同上

第一章 商

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以前，商族已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强大的部落。

商的始祖名契，《史记·殷本纪》记载，契曾佐禹治水有功。契十三传至汤，势力愈强，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随着夏族势力的衰落，商族四出征伐，最后终于取代夏的地位，逐步建立了南至长江、北至燕山、西至陕西、东至于海滨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从成汤建国到帝辛被周族所灭，商朝共经过了六百余年的时间。

整个商代的历史，是我国灿烂的青铜文化从开创向高峰发展的历史，也是我国的奴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举世闻名的中国文化古都——安阳殷墟的发掘，使埋没了三千多年的雄伟而古朴的宫殿建筑基址又重见天日，把殉有大量奴隶和无数珍奇异物的贵族陵墓又揭示在我们眼前；各种奴隶作坊、仓窖、工具、武器以及其他物品也被发现了。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晚商王室占卜时所刻的文字记录——甲骨卜辞。通过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已经大体证实了《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和《世本》等书所记载的商代史实。

所有这些发现，使我们有足够的实物证据确证商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时的社会已是奴隶社会。它给陈独秀、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散布的中国没有奴隶社会的谬论以致命的打击。

但是，安阳殷墟只是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遗址。它所代表的这个历史时期，奴隶制度已有高度发展，青铜文化已进入高峰阶段，在此以前，商文化显然经历了更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因此，对于盘庚迁殷以前商文化的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解放后，1950年在郑州发现的以二里岡上下层为代表的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的商代遗址，从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早于安阳殷墟的商文化而又与它直接啣接着，从而把我们对商代社会历史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在郑州，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了青铜铸造、制陶、制骨等作坊址，殉有奴隶和青铜器的奴隶主墓葬以及夯土城墙墙基等。这些发现，都给商代前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史料。

为了更进一步追溯郑州二里岡期商文化的来源，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们在黄河中下游南北两岸开展了大量的野外考古调查工作，终于在河南伊洛地区发现了一种处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岡期商文化之间的“二里头类型”文化。由于这种文化的发现，特别是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使我们有可能把我国的文明史追溯到更早的阶段。

《史记·殷本纪》和《尚书·序》都有“汤始居亳”的记载，经过古今历史学家的考证，大都认为商汤所居的亳邑是在河南省偃师县西十多里的地方，而现在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正好相当于其所指的范围。从遗址范围之广、堆积之厚、宫殿建筑基址的存在和文化内涵反映的社会面貌来判断，二里头有可能就是商汤建都的亳邑，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西亳。庞大的宫殿建筑基址是奴隶制国家的象征，说明至少在这时我国的历史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在二里头早商遗址中还发现了较原始的青铜器，从而把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比郑州二里岡期商文

化又提早了一个阶段，更使得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为适应其主子对我国侵略扩张需要而杜撰的“中国青铜文化北来说”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我们知道，在商立国之前还有夏代。从有限的文献资料分析，夏代正处于由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历史阶段。对于夏文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曾经有过多种推测，也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目前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难于作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二里头类型遗址的发掘，至少给夏文化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比较研究的材料。随着这一历史时期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关于夏代的历史，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一定会作出科学的说明。

第一节 商代早期

一、二里头类型商文化的发现、特征与分期

二里头类型商文化遗址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已经被人们发现了，由于当时对这种文化的性质还缺乏认识，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

1956年在郑州洛达庙的发掘，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出土陶器的分析，发现这类遗址和郑州二里岡商代遗址比较“有其独立的特征”，并初步判定洛达庙文化是早于郑州二里岡商代文化的一种遗存。^①

1959年开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发掘，第一次发现了郑州二里岡期的商代灰坑打破洛达庙类型文化层和洛达庙类型文化层迭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的现象，从而从层位关系上确定了这类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岡期商文化的相对年代。^②

二里头遗址位于偃师县城西南9公里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北面紧靠洛河，南面距伊河约5公里。遗址面积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文化堆积比较单纯，主要是二里头类型文化层。由于二里头遗址范围广大，遗迹丰富，地层关系清楚，在同类遗址中，二里头遗址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我们认为把这一类型的遗址命名为“二里头类型商文化”似较为合适。

根据考古调查，“二里头类型商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是河南省西部，在这一带迄今已发现了几十处遗址。（图一）其中经过发掘的除洛达庙、二里头外，还有洛阳东干沟、^③郑州上街、^④偃师灰咀、^⑤陕县七里舖、^⑥巩县稍柴等处。这类遗址或遗物在豫东、晋南等地也有发现。

①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洛达庙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57，10：48）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65，5：215）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8年洛阳东干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59，10：537）

④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上街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60，6：11）

⑤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偃师灰咀遗址发掘简报》（《文物》59，12：41）

⑥ 黄河水库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陕县七里舖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60，1：25）

二里头类型商文化的特点是：陶器鼎多鬲少，以夹砂长腹罐为主要炊器，三足盘、平底盆、口沿有绳切纹带把的小罐、澄滤器等为常见的器物，觚、爵、罍、盃等酒器开始流行；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镰普遍大量使用，并已有了小件青铜工具。

根据对二里头遗址文化层次及其遗物的研究，一般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商文化分为三期：早期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保留着浓厚的河南龙山文化作风，如陶器多平底，纹饰以兰纹为主，方格纹也有一定的数量，盆、罐等器物几乎与龙山文化同类器物很难区分；（图二）晚期则和二里岗期商文化紧密衔接，是二里岗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如陶器流行圆底，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壁内侧盛行麻点装饰等是二者共有的特征；（图四）中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爵、大口尊等器类出现于中期，流行于晚期，云雷纹、器壁内侧的麻点装饰等也是始见于中期，到晚期才普遍起来，因此中期和晚期很难截然划分，可以作为一个阶段看待。（图三）二里头类型商文化早期和晚期的显著差别，说明该文化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也可能反映了其间的重大变化。

二、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状况

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任何一种新技术、新工具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青铜器的发明和使用也是这样，它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准备阶段。

我们知道，在青铜时代之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居民已经发明和使用红铜器，在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相当或略晚的齐家文化中就曾发现过红铜制成的小刀、锥、凿和指环。由于红铜质地柔软，用红铜制成的工具不如石器坚硬和锋利，在生产中起的作用是很微小的。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人们终于对冶炼红铜的技术进行了革新，由于红铜加锡的结果，不仅降低了熔点，而且获得了一种硬度比红铜大得多的全新的合金——青铜，从而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青铜器时代。根据现有的资料，二里头类型商文化正处于这个时代的初始阶段。

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东干沟等遗址中发掘不少铜渣、坩锅残片、陶范残片和小件铜器，经过对铜器的化学分析，证明已是青铜。^①

这些小件青铜器的制作是十分原始的。我们见到的除一件铜铃外，主要有刀、锥、钻、镰、锯、鱼钩等，（图五）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器小而薄，造形简单，几乎全是模仿骨、蚌、陶等各种质料的同类器具铸成的。如小切刀刃部仅长3—4厘米，有的刃部和柄尚无明显分界。小刻刀更简单，用小铜条在一端做出刃部就成了，一般长约4厘米，刃宽不到1厘米，有的在柄端还残留有夹木柄的痕迹，这种小刻刀大约是制陶、制骨用的雕镂工具。铜镰的形式较比进步些，双翼向前聚成前锋，中间有脊，断面作菱形，脊后有铤，脊铤相连处有明显的界线。但是这种铜镰在样式上也不是新的创造，在和它同出的骨镰、蚌镰中也能找到它的祖型。

青铜制品的原始性质，反映了铸造技术的简陋，这说明人们开始掌握这种新技术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这些发现不多的原始青铜器，从用途上看，除了那件铜铃外，都是手工工具和渔猎工具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65：5：215）

(铜镞也可作武器)，这说明青铜器的起源是与生产密切相关的，把生产工具排除于人类最初的青铜制品之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里头类型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青铜容器，但从已采用双合范铸造铜铃来看，铸造简单青铜容器的技术很可能已经掌握了。

从青铜器加入社会生产领域开始，便成了传统的生产工具——石器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这无疑对于农业、手工业之间和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将起到十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正如恩格斯正确指出的：“**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①特别是还处于青铜文化初期阶段的早商时期，情况就更是这样。在经过发掘的遗址中，并不是都有青铜器的发现，在发现不多的青铜器中，多是小型的手工工具，还没有一种可以用到农业生产上。因此在这个阶段，整个文化面貌还保留着浓厚的石器时代的特征，主要的生产工具仍然是用石、骨、蚌、陶制成的。

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铲、镰、刀、斧等，以石制的最多，也有骨、蚌质料的。(图五)扁平石铲、凹刃石镰的普遍大量使用，说明松土和收割的效率比龙山文化有了显著的进步。

捕鱼、狩猎和手工业工具，除了不多的青铜器，经常见到的有骨鱼叉、骨鱼钩、陶网坠、骨镞、蚌镞、石镞、石矛头和石凿、石镑、骨锥、骨针、陶纺轮、石杵臼等。(图六)基本上和龙山文化时期人们使用的工具没有多大区别。

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农业，家畜饲养是重要的部门，渔猎业也是不可缺少的辅助性生产。遗址中酒器的存在，表明农业生产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没有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分工，生产力的提高，交换也进一步发展了。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一些玉、贝和松绿石饰，这些都非当地所产，应该是通过交换和贸易得来的。商代晚期，贝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商王曾用贝赏赐臣下，考古发掘中不仅有海贝，而且有骨贝、铜贝出土。有趣的是，在二里头类型商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仿海贝制成的骨贝和石贝，^②(图八)大约在这时，贝不仅是装饰品，而且也已经作为交换手段使用了。

三、居址与埋葬反映的阶级对立。国家出现的象征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农业、手工业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的发展，阶级之间的分化与斗争更加明显和尖锐了。

二里头类型商文化遗址虽然发掘的面积不大，研究工作也刚刚开始，但是许多迹象表明，当时不仅存在着阶级，而且国家也已经形成了。

在二里头、上街等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人们的居住址。二里头发现的房基有长约9—10米、宽5米左右的，居住面坚硬，铺有薄层料姜石面，有的在居住面上还发现了柱子洞和四边磨光的柱础石，显然这是一种从地面上建造起来的比较宽敞的房子。而在上街发现的就大不一样了。这是一些没有一定形状的带有台阶和斜坡通道的窖穴，穴口直径或长宽都不到3米。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4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66：1：1）

假如不是在穴底发现了烧灶和烧土面，我们很难断定这是住人的地方。不难看出，这两种不同的居住址是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人们使用的。在窖穴居址中曾经出土过石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这种窄小而又潮湿的地穴是当时的生产者——奴隶或平民赖以栖息的场所，而那比较宽敞的房子则是奴隶主们的居室。

最能说明这时期阶级对立状况和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二里头宫殿基址的发掘。^①

宫殿基址位于二里头遗址的中部，这是一处面积约有10000平方米、厚约1—2米的夯土台基。（图七）台基经过两次夯筑和使用，上部是红夯土，下部是花夯土，红夯土面积比花夯土略小。在两层基址的东、南边缘上都发现有路土和料姜面，呈斜坡向外延申下去，说明台基比当时的地面要高出很多。通过钻探和基址东、南、东北部的发掘，知道红夯土宫殿基址的完整形状可能是略呈凸字形，东西、南北的全长各约100米。在宫殿基址的东、南和东北边缘及内部都发现有柱子洞和夯土面上的柱础石，柱子洞排列整齐规则、间距约为3.8米，柱子洞呈圆筒形，口径约0.5、深0.4—1.9米不等，在洞的底部都垫有一块柱础石，柱础石的形状多呈四方形，有平面，但也有不甚规则的，一般直径约1米、厚约0.16—0.2米。另一种柱础石是在基址的表面而不是深埋在夯土内，说明当时的柱子，有的是下面一段埋在基址中，有的是立在基址地面上。在基址东北部的发掘，还发现距边沿3.9米处有一道夯土槽基，宽0.36—0.4、深0.4米，在槽基内有排列整齐的柱础石，间距0.8—1米，有的显露在夯土基址的表面，有的盖在夯土基址面下。夯土槽基东西残长10余米，南北残长30余米，两段夯土槽相接处大致成直角。根据以上情况推测，夯土槽基可能是宫殿的墙基。在夯土槽基之西，还发现两行平行的南北向的柱子洞，柱子洞和槽基以及柱子洞之间的间距约为3.8米。

有些地方，宫殿基址被二里头类型商文化晚期灰坑和墓葬打破，说明宫殿建筑的年代要比二里头类型商文化晚期早一些，约在中、晚期之间。

在宫殿基址的南面约50米处，也钻探出三片小型建筑基址，面积都只有几百平方米，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由于这座庞大的宫殿基址及其周围的建筑遗迹没有完全揭露出来，目前我们还不能清楚地了解其具体结构和布局的全貌，但是可以想像，它一定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商王活动的地方。

建造这样宏伟的宫殿，在没有阶级压迫的原始公社制度下是不可思议的，显然这是在阶级奴役制度下实行强制劳动的产物。因此，宫殿基址的发现，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奴隶们简单劳动协作的奇迹，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宫殿本身也是暴力机关——奴隶制国家已经出现的象征。

阶级的分化与对立在二里头类型商文化的埋葬中也有明显的反映。

二里头遗址迄今尚未发现和宏伟的宫殿基址相称的贵族奴隶主的墓葬。从二里头类型商文化遗址已发掘的几十座墓葬分析，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一定葬式和墓圻、一般都有随葬品的墓葬；一类是散见于灰坑、灰层中的骨架，无随葬品也无一定葬式，往往是骨骼不全、身首异处或被捆绑活埋者。后一种埋葬的情形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而在二里头类型文化中则更为普遍。从其被杀或被活埋致死的情形看，这种人是毫无人身自由的，很可能是军事俘虏或奴隶。前一种具有墓圻、随葬品和一定葬式的墓葬则可能是自由民的遗存。在这一类墓葬中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多数有随葬品，陶器多的达21件，以觚、爵、斚、盃等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65：5：215）

酒器为主，且有松绿石、玉、贝等装饰品，少数无随葬品，或仅有一、二件陶器和装饰品，亦有随葬生产工具者。这种差别或许反映了自由民阶层的分化，随葬一、二件陶器或无随葬品的可能是一般的平民，而有较多酒器和装饰品的则可能是奴隶主身分的人。

四、祭祀与占卜。文化艺术

氏族社会末期出现的祭祀与占卜等迷信活动，到早商时代已经普遍流行了。

在灰坑和灰层中经常遇到埋葬完整家畜骨架的现象，有些骨架看得出是随意抛掷的，有的很明显是有意识摆放的。如在郑州洛达庙一个直径5米左右的灰坑底部，发现有7个小坑，每一坑中埋一家畜骨架（其中有一坑埋两具），共埋三羊五牛，骨架保存完好，无紊乱现象，葬式全是侧身向外，坑内并出有短颈绳纹大口尊、深腹盆、小口高领甗、鬲、罐、鼎、爵等，^①无疑这是祭祀的遗迹。这说明埋牲祭祀的仪式至少在商代早期已经存在了。

前面已经提到，考古发掘中也常见到散见于灰坑、灰层中的零星人骨或人架丛葬坑，其中有的是将俘虏或奴隶杀死之后随地抛掷的，有的可能也是祭祀的遗迹。氏族社会出现的原始宗教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奴隶主进行祭祀，随便可以杀死俘虏和奴隶充作牺牲。

在祭祀或进行其他活动时，还要占卜。卜骨的材料仍为猪、牛、羊的肩胛骨，如同龙山文化时期一样，大部分都未整治，有灼无钻。（图八）

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文化艺术品，如陶塑蛤蟆、鸟、龟、羊头、人头等，造形生动、富于写实气息，较龙山文化有了进步。（图八）浅刻花纹中有龙山文化不见或少见的云雷纹和饕餮纹，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发现了两条龙形花纹，^②一条是巨眼，利爪，周身有鳞；一条是一头二身，眼珠外凸。在龙形花纹的浅刻线条内均涂有朱砂，眼眶内并涂有翠绿色。这种形象的动物实际上并不存在，但在我国古代传说中却是十分神秘的东西，它的发现反映了当时艺术作品中的神秘色彩，也为我们研究龙的传说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资料。

装饰品有贝、松绿石串珠、陶串珠、玉琮、玉玦、长条形玉饰和束发之用的骨笄。乐器有陶埙。（图八）

第二节 商代中期

一、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发现及其分布。特征与分期

二里头类型商文化之后，继起的是二里冈期商文化。这类商代遗存是解放后在河南郑州首先发现的。

郑州是商族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1950年在郑州市旧城南面不远的二里冈首次发现商代遗址，堆积丰厚，文化内涵单纯。其后的发掘证明，在现在的郑州市区和郊区到处都分布着这一类型的商代遗存，除了居址和墓葬，还发现了铸铜、制骨、制陶等作坊遗址和夯土城

^① 转引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58级学生河南实习组专题实习报告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65：5：215）

墙。(图九)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的发掘,发现了相当于安阳殷墟的晚商文化层迭压在二里冈类型商文化层之上的地层关系,从而肯定了这类遗存的相对年代早于安阳殷墟。^①为了区别于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我们把这一类型的商文化称为二里冈期商文化。

根据《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的记载,从汤到盘庚共经十代二十王,在大约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商王曾经五次迁都,经常对外进行战争,奴隶制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政治版图也更加扩大了。无论在中原地区的伊、洛、黄、淮流域,还是在商王国边远地区的陕西华县、山东临淄、湖北黄陂都发现了二里冈期商文化遗址。有的遗址相距数千里,但是都具备了大体一致的文化特征,说明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以及部族的逐渐融合,统一的文化也以更快的速度形成了。

二里冈期商文化是由二里头类型商文化发展来的,在文化面貌上表现了一脉相承的作风,如二里冈期陶器的种类多数在二里头类型文化中已经出现,制法以轮制、模制和轮模合制为主,绳纹是主要纹饰,器形流行圜底等都和二里头文化相同。但是二里冈期商文化又有区别于二里头类型商文化的特点,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一定的进步性,如多种类别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青铜钁在农业上的使用,可以视作原始瓷器的釉陶的烧造等都是二里头类型商文化不曾有的。表现在陶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如二里头类型商文化以夹砂长腹罐为主要炊器,二里冈期商文化则以鬲为主要炊器;三足盘是二里头类型商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而在二里冈期商文化中则极少见。即使同类器物,在型制上也有明显不同。

二里冈期商文化本身也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考古工作者根据郑州二里冈的发掘,将二里冈期商文化区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出土的陶器器壁较薄,绳纹较细,口沿多圆唇外卷,形制作风接近二里头类型商文化晚期的陶器;(图十)上层出土的陶器器壁较厚,绳纹较粗,口沿多方唇外折,形制作风类似安阳殷墟晚商文化第一期的陶器。^②(图十一)

解放前,除了安阳殷墟,几乎没有发现别的重要商代遗址,人们对于盘庚迁殷以前商代历史的了解十分贫乏。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发现象二里头类型商文化的发现一样,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对商代历史的认识,为我国青铜时代——奴隶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城市的出现

奴隶数目的增多,奴隶劳动在生产上的应用,使生产发展的速度加快了。从商代早期到中期,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石、骨、蚌器仍是传统的生产工具,有的已有明显的改进。通常发现的挖土工具是扁平石铲,有时兼有蚌铲和骨铲;主要的收割工具是石镰和蚌镰,石刀、蚌刀几乎不见,(图十二)在郑州二里冈发掘的53条探沟(10×2m²)和24个灰坑中,仅出了3把残石刀和9把蚌刀,而石镰却出了121把,蚌镰19把。^③石镰多呈凸背凹刃,有胡,已趋定型化。

① 郑州市文物工作组:《郑州市殷商遗址地层关系介绍》(《文物参考资料》54:12:86)

又见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56:3:77)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14—15页 科学出版社 1959年

③ 据《郑州二里冈》统计表十四、十七、十八合计

农业工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掘土工具青铜钁的使用。(图十三)郑州南关外铸铜作坊遗址出土近两千件陶范,其中钁范的数量仅次于镞范,说明这种掘土工具是青铜手工业作坊中的主要产品之一,在农业生产上已有相当数量的使用。只是因为青铜贵重,用残之后,还可回炉重铸,不象石、骨、蚌器用残之后随地委弃,因此不能大量发现。否认青铜钁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郑州发现的青铜钁和战国时期掘土用的铁钁形制几乎完全一样,无论作为斧或铤都不会是很适用的。但是绝不能夸大青铜器在农业生产上的作用,因为第一,青铜器因其本身的弱点,不能完全排除石器;第二,正如马克思所说,“只使用最粗糙笨重,并且因为笨重所以难于损坏的工具”^①是奴隶制生产方式下的一个经济原则。

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的收获量也增多了,奴隶主有可能从奴隶和平民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对居住遗址的发掘,在居址的附近,发现了分布密集的大型窖穴,有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三种,以长方形最多,穴口一般长2米左右,宽1米多,窖深有达8—9米者,为了上下方便,穴壁上多挖有对称的脚窝。(图十四)这些大而深的窖穴,有的可能充作它用,但不少应是贮藏粮食的仓窖。

粮食的增多,也使饮酒的风气更盛了。在一般的墓葬中,常发现觚、爵、斚之类的酒器,这些酒器不仅有陶质的,而且已用青铜铸造,在奴隶主的墓葬中,就发现了成组的青铜酒器。

作为农业的补充,畜牧与渔猎仍是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渔猎生产工具除了骨镞、蚌镞、陶网坠、石网坠和石弹丸外,也发现了铜镞和铜鱼钩,形制与早商发现的没有多大的区别。(图十五)

遗址中经常发现猪、狗、羊和牛的骨架,有的地方还发现了马的骨架,大约除了猪、狗、羊之外,牛和马也被驯养成了家畜。

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为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提供了基础。到了商代中期,重要的手工业不仅从农业进一步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且在手工业内部也有了固定的分工,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

青铜冶铸业是最先进的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在发掘过的二里岗期商文化遗址中,不少地方发现了青铜遗物和冶铸青铜留下的铜渣与陶范。这时期不仅能铸造刀、镞、锥、钻之类的小件工具,而且还铸造了斧、钁、戈、矛等大件的工具和武器,以及鼎、鬲、斚、爵、觚、盘、盂等青铜容器。(图十九)青铜器在社会生产与生活领域已较广泛地使用了。

在郑州紫荆山北和南关外发现了两处冶铸青铜作坊遗址,南关外的一处,总面积已达1000平方米以上。在这里发现了几处表面粘附铜渣的硬土面,面积较大的一处约计7平方米($2.25 \times 3.1\text{m}^2$),在这个硬土面上分布有16个凹下的圆形窝,窝中有铜渣,也许这种小圆窝是灌注铜液用的。在硬土面的周围和附近还发现了木炭屑、铜矿石、坩锅片、砺石和许多陶范,陶范中以镞、钁范最多,大约这是一处以铸铜镞和铜钁为主的作坊。而紫荆山北的一处,出土的陶范主要是镞范和刀范,表明它是以铸镞和刀为主。在这时,青铜手工业内部有了一定的分工。

两处作坊遗址中都发现了炼铜的坩锅,一种是泥质陶大口尊,一种是砂质陶大口缸。(图十七)为了加固器壁,内外都涂有厚厚一层草拌泥,因经高温,外部呈红色,器内壁则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3页 注17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呈青灰色，有的并附有铜渣。同样的大口尊和大口缸在居住遗址中也有发现，但这些器物的内壁多数粘有白色水锈，与炼铜无关，很可能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坩锅，大口尊和大口缸都是被借用为坩锅使用的。

冶铸青铜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说来可分为冶和铸两大步骤。从郑州发现的炼铜遗址的情况看来，当时炼铜似乎是在露天进行的，大概是把选好的矿砂放在坩锅内，以木炭，然后生火，也可能经过鼓风，铜即被还原熔为液体而流出，弃去炼渣，即得初铜。初铜是比较粗的，再经提炼才成为纯净的红铜。红铜加锡熔成合金，即是青铜。青铜合金中，铜和锡的成分，则依器物的用途不同而用不同的比例，通常是锐利的工具和武器加锡较多，而一般器皿则加锡较少。曾经用化学分析的沉淀法分析过一件铜尊，其结果是：铜91.29%；锡7.10%；铅1.12%。含锡量低，是早期青铜器应有的现象。

从发现的青铜器和陶范观察，当时铸造工具和武器已普遍使用双合范；铸造容器已采用三合范或多范。每扇陶范都有子母口或榫头榫眼，有的又留有注铜口，以便倾入铜液，并有气孔，以便铜液灌注时使范内的空气经气孔流散。

这时期铸造的青铜容器，器壁较薄，花纹简单，形制多模仿陶器，与高度发展的晚商青铜文化相比，铸造技术还处在早期阶段，但是和早商相比，却是飞跃的进步，而且这些青铜器，不仅在中原地区的郑州、辉县发现，远在长江流域的湖北黄陂也有出土，^①可见在当时的商王国领域内，青铜器已经普遍流行。

工具和武器的生产量更大，在郑州发现的陶范中，镞、刀、钺范最多，刀、钺范一次可铸好五、六器。铜镞是消耗性的武器，射出之后不能收回，世界上其他青铜文化极少发现青铜镞，原因即在此。铜镞的大量生产，表明青铜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二里岗期商文化已是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

制陶也是重要的生产部门，象青铜手工业一样，这时不仅已是独立的行业，而且内部有了固定的分工。

郑州人民公园以西，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制陶工场，在约14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陶窑14座，房基十余座，有的房基显然与制陶有关。陶窑呈园形，上有窑室，下有火膛和火门，中间有箅子相隔，箅上有圆孔，箅下有的有方形竖柱支撑。在陶窑和房基的周围出土了几十件陶拍子和陶印模，（图十六）以及大量烧流、烧坏的残毁陶器。^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器都是泥质的，从器形看主要是盆和甗，这说明制陶业内部已经有了固定的分工，产品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作坊主自己使用。发现的陶印模上，有的刻有铜器上的典型纹饰饕餮纹和云雷纹，说明这处制陶工场不仅烧制一般的生活器皿，也烧制比较讲究的仿铜陶器如甗、鬲、斚等。（图十七）

代表制陶工业先进水平的是硬陶和釉陶的烧造。（图十七）这两种陶器用高岭土制成，火候高达摄氏千度以上，质地坚硬，没有显著的吸水性。釉陶所用的釉经过化学分析，其成分和一般早期瓷釉相近，^③实际上已接近瓷器，因此可以把釉陶称为原始的瓷器。这样，就把我国发明瓷器的历史提早到了三千多年前的中商时代。

① 郭德维等：《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和墓葬》（《考古》64：8：420）

② 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文物参考资料》57：8：16）

③ 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文物》60：8、9：68）

关于硬陶和釉陶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这两种陶器，无论从颜色、质地与纹饰各方面看都与长江流域流行的印纹硬陶有相似之处，在湖北黄陂盘龙城中商遗址中也曾发现过这类的釉陶，这说明当时中原地区和南方已有密切的交往关系，烧制硬陶和釉陶的技术从南方传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不能否认当时中原地区已能烧制这类器物，在郑州发现的硬陶和釉陶有些器形具有明显的商文化风格，而且还发现有烧流的硬陶，就是极好的证明。

骨器的制作，也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来进行生产。在郑州紫荆山北炼铜遗址的北面发现了一处制骨作坊的废墟，出土了大批骨料、半成品和制成的骨锥、骨笄等，也有不少磨制骨器的砺石。经过鉴定，骨料中有牛骨、猪骨，此外还有鹿角，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半以上是人骨。这深刻地揭露了建立在对奴隶残酷压迫、剥削基础之上的奴隶制度的本质，同时也表明了这处制骨作坊的性质，作坊的主人若不是奴隶主，是决不会用奴隶的骨骼作骨料的。

农业与手工业分工的扩大，专门手工业作坊的出现，促使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了。早商时代大约已经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在中商时代发现的更多了，郑州和辉县的墓葬中常有随葬贝的现象，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墓葬中就发现穿孔贝四百六十余枚，显然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区域经济中心逐渐形成，在国王和大贵族居住的地方，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随着手工业、商业的集中和发展，也成了经济的中心，于是，作为与乡村对立的早期城市出现了。

在郑州旧城内外面积约二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几乎到处都分布着居住遗址，范围之广，堆积之厚，不仅原始社会的村落遗址不能与其相比，即使是早商时代王宫所在地的二里头遗址也相形见绌。除了居民点，也发现有作坊遗迹，重要的有：紫荆山北和南关外的炼铜作坊，紫荆山北的制骨作坊，铭功路西的制陶作坊等。在白家庄和铭功路西还发现了不少当时的奴隶主墓葬。

特别是1955年在遗址中心区又发现了城墙的遗迹，^①由于工作作的不多，目前还不能确切肯定城墙的范围，但城墙的时代，至少白家庄附近的一段可以证明确属中商无疑，因为在这里的北、东两段残墙上都发现了被商代中期的房基和墓葬打破的现象，城墙夯土中也不见更晚的遗物。根据白家庄附近的发掘，墙基一般宽19—20米，夯层厚7—10厘米，修筑得十分坚固。

城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抗阶级斗争加剧的产物，国王和贵族为了防御奴隶与平民的暴动，同时也为了抵御外部敌人的袭击，往往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建造高耸而坚固的城墙作为屏障。

以上情况表明，这里不是一般的邑落，而是一处规模宏大的都会。有的同志曾推测可能是商王仲丁所迁的囂都，^②不过目前尚缺乏可靠的证据。

三、居址与墓葬。阶级的进一步分化与专门武器的出现

商代中期遗址中尚未发现大规模建筑遗迹，目前发现最大的房基有长达16.2米、宽7.6米

^①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57:1:53）

^② 安金槐：《试论郑州商代城址——囂都》（《文物》61:4:5:73）